

数智转型背景下江西职业本科网络与新媒体专业学生能力错位与重构路径

李珍珍

(江西软件职业技术大学,江西南昌,330041)

版权说明: 本文是根据知识共享署名 - 非商业性使用 4.0 国际许可协议进行发布的开放获取文章。允许以任何方式分享与复制, 只需要注明原作者和文章来源, 并禁止将其用于商业目的。

摘要: 数智技术正在重塑新媒体内容生产、传播组织和岗位能力要求, 这使职业本科网络与新媒体专业原有的培养目标、课程内容和实践方式已经难以完全适应现实需要。本文立足职业本科教育的类型定位, 以江西红色文化数字传播为具体情境, 通过文献分析与案例归纳, 从培养目标、课程结构、技术训练、价值教育、实践教学、学习评价六个方面, 考察网络与新媒体专业学生培养中存在的错位问题。研究发现, 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某一项技能训练不足, 而在于学生原有的内容生产能力, 同数据分析、智能工具运用、跨平台传播、史实核验与价值判断等能力之间, 缺少内在的衔接。据此, 本文提出应结合岗位实际工作过程调整培养目标和课程内容, 把红色文化内容生产转化为持续开展的专业实践任务, 对大模型在选题、脚本、分镜、传播分析中的使用作出规范, 并在教师指导、校企合作、过程评价等环节做出相应调整。这些改革应立足职业本科教育的特点, 在技术应用、内容质量与价值导向之间寻求平衡, 探索出与区域文化传播需求相适应的网络与新媒体专业人才培养方式。

关键词: 数智转型; 职业本科; 网络与新媒体专业; 大模型

DOI: <https://doi.org/10.62177/aper.v2i4.1617>

一、引言

新媒体行业正从媒介融合走向更深层次的数智传播阶段, 内容生产的方式、平台传播的逻辑、职业岗位的结构都在快速调整之中, 这给新闻传播与新媒体教育带来了重新界定人才规格和能力结构的压力。已有研究指出, 职业本科数字媒体人才培养不能再停留在传统技能训练的层面, 而需要更多关注产业需求、岗位能力与实践环节之间的协同(魏伟等, 2023; 吴一鸣、孙凯, 2025)。王茜(2021)对智媒体背

作者简介: 李珍珍(1990-), 女, 讲师, 研究方向: 教育改革, E-mail: 447182475@qq.com。

基金项目: “江西省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教学改革研究课题”——“红色数智叙事+大模型赋能”的职业本科新媒体技能人才培养模式研究(课题编号: JXJG-25-87-11)。

景下全媒体运营师培养的考察也表明,这一岗位正呈现出明显的跨界与重构特征,对内容策划、平台运营、数据分析和综合传播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从职业教育改革的实践看,网络与新媒体专业人才培养模式已经是专业建设中绕不开的议题。有研究通过对行业企业、学校和毕业生的调研发现,网络与新媒体专业人才培养应当以职业能力为导向,通过专业建设、实践教学体系优化和师资队伍提升来推动模式改革;也有研究从应用型高校网络与新媒体专业建设的角度出发,强调现代职业教育体系下的人才培养必须体现类型特色、能力本位和实践导向(李光辉、林嵩,2024)。这些成果为职业本科网络与新媒体专业人才培养提供了重要参照,不过对数智转型背景下能力结构错位这一问题,讨论得还不够充分。

江西的红色文化资源较为丰富。数字媒介的发展,为革命历史、红色人物和红色精神的当代表达提供了新的条件,但也对内容生产者的史实辨析、叙事转换、技术运用和传播判断提出了更高要求。红色文化数字传播不是简单地把已有的文字、图片搬到网络平台上,而是需要按照不同媒介各自的表达规律,对内容重新组织、转化和呈现。刘黎、郑海燕(2022)指出,红色文化数字传播应重视视觉元素的提炼、传播场景的建设和跨领域合作;姜晔等(2022)则认为,红色文化遗产的数字化传播需要同时兼顾资源保存、内容开发与创新表达之间的关系。由此看来,红色文化传播完全可以作为检验网络与新媒体专业学生综合能力的真实任务。

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发展,进一步改变了内容生产的具体过程。大模型能够参与资料整理、选题分析、文本草拟、分镜设计和传播反馈处理等环节,但会用工具,不等于具备了相应的能力。徐国庆等(2023)指出,生成式人工智能将持续影响职业、职业能力和职业教育人才培养,职业教育有必要重新认识技能的内容及其形成方式。若学生只会调用工具,却不能判断材料真伪、修正表达偏差、承担内容责任,技术的使用反而可能削弱专业训练的效果。基于此,职业本科网络与新媒体专业人才培养需要回答两个相互关联的问题:现有培养内容与数智传播岗位的要求之间存在哪些不适应?又该如何在区域文化传播实践中调整能力结构和教学方式?

本文采用文献分析和案例归纳的方法,结合职业本科教育的定位、新媒体岗位的变化,以及江西红色文化数字传播的实践需要,讨论网络与新媒体专业学生能力错位的具体表现及其成因,并在此基础上,结合职业本科网络与新媒体专业的课程设置、实践条件和教学改革需要,提出相应的调整思路。需要说明的是,本文属于课题研究的阶段性成果,主要任务在于明确问题、提出框架、说明实施条件,至于学生能力变化和教学效果的量化检验,还有待后续课程实践继续开展。

二、数智转型对职业本科网络与新媒体专业学生能力结构的新要求

(一) 内容生产由单项操作转向综合处理

过去,网络与新媒体专业的技能教学多围绕摄影摄像、图像处理、视频剪辑、文案写作、平台发布等单项操作展开。这些技能至今仍是专业学习的基础,但在实际工作中,很少再按彼此分离的方式单独进行。一个新媒体项目往往涉及选题判断、资料核验、受众分析、脚本写作、视听制作、平台适配、数据观察和内容修订等多个环节。岗位真正需要的,不是让学生多学几款软件,而是能在具体任务中把知识和技术综合起来运用。职业本科教育强调的是较高层次的技术技能,课程设置理应帮助学生理解完整的工作过程,并根据内容目的选择合适的表达方式。

大模型和生成式工具进入内容生产环节后,不少基础性工作可以更快完成,学生的专业能力也就更多体现在问题提出、资料选择、结果判断和后期修订上。他们需要理解工具生成内容的依据和局限,能够发现其中的事实错误、逻辑缺陷、风格趋同和价值偏差。如果教学还停留在模仿软件操作步骤的层面,

学生即便掌握了若干工具，恐怕也难以应对岗位中不断变化的任务要求。

（二）传播工作更加重视数据意识和平台理解

平台化传播让内容生产与用户反馈之间的联系变得更加紧密（江波等，2023）。阅读量、完播率、互动率、用户停留时间这些数据，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内容在具体平台中的传播状况。网络与新媒体专业学生不仅要会读取这些基本数据，还要理解数据背后反映出的传播行为，不能把流量指标当成唯一的判断标准。他们需要具备基本的数据整理、比较和解释能力，能够根据传播目标去调整内容，但不应为了迎合平台偏好而牺牲内容质量。

不同平台在用户构成、内容形态、推荐方式和互动习惯等方面存在差异（王茜，2021）。同样的红色文化题材，用在短视频、微信公众号、互动网页或虚拟展陈上，需要采用不同的信息结构和叙事节奏。平台运营能力因此不能简单理解为机械发布和日常维护，而应当包含受众认识、媒介选择、内容适配和传播效果分析等内容。

（三）红色文化传播要求技术能力与价值判断相统一

红色文化内容有明确的历史基础和价值属性。学生在创作相关内容时，需要查阅权威资料，分清史实、艺术加工和网络传言的界限，妥善处理人物、事件和场景之间的关系。数字技术固然能丰富红色文化的表现形式，但代替不了对历史材料的认真阅读，更不能靠技术效果去掩盖内容上的空泛。汪路金等（2022）对红色文化资源数字化保护的研究也表明，资源整理、规范管理和有效利用，是数字传播能够展开的重要基础。

大模型有可能生成看起来完整、实际上事实依据不足的内容，图像和视频生成工具也可能在服饰、建筑、人物关系和历史环境上出现错置（张黎等，2023；童慧、杨彦军，2024；王佑镁等，2024）。正因如此，网络与新媒体专业的价值教育不能只停留在课堂上，而应贯穿选题、资料、制作、审核、发布的各个环节。教师既要帮助学生理解红色文化的精神内涵，也要建立清晰的资料来源记录和内容审核要求，让学生逐渐形成对公共传播负责的职业意识。

三、职业本科网络与新媒体专业学生培养中的能力错位

（一）培养目标与岗位综合能力要求不够一致

一些人才培养方案虽然用上了全媒体、数字化、创新能力这类表述，但课程目标实际上仍然落在软件操作和作品完成上。培养目标和课程实施之间存在一定的落差：学生能完成单项作业，却未必能独立处理真实项目中的复杂问题。尤其是当选题价值、受众需求、资料真实性、平台规则和传播效果需要同时考虑时，原有的技能结构就容易显得零散、不成体系。

职业本科既不同于普通本科，也不同于专科层次的技能训练（魏伟等，2023）。网络与新媒体专业的人才培养，应在扎实操作能力的基础上，突出技术理解、项目组织、问题解决和应用创新。如果培养目标没能把这些要求转化为可教学、可评价的具体能力，专业建设就很容易停留在名称更新和课程增减这类表面调整上。

（二）课程内容更新滞后于内容生产方式变化

新媒体技术更新的速度较快，而课程内容的调整往往要经过人才培养方案修订、课程标准论证、教学资源建设等一系列过程，二者在时间上难免存在落差。有些课程仍按软件功能来安排章节，较少围绕实际项目组织知识，学生学会了剪辑、排版、拍摄的基本方法，却缺少把调查、策划、写作、制作和传播分析结合起来的训练。

生成式人工智能进入课堂之后，还容易带来两种偏向（周洪宇、李宇阳，2023；吴砥、吴河江，

2024):一种是把工具演示当作教学改革的主要内容,忽视了专业知识和基本功的训练;另一种则是出于担心学生依赖工具,索性完全排斥其使用。前者容易让教学流于表面,后者又与行业实际脱节。相对合理的做法,或许是明确哪些环节可以用工具、用完之后要完成哪些核验、最终成果由谁负责,并把这些要求写进课程任务和评价标准里。

(三) 传统技能训练与人机协同创作要求存在距离

大模型辅助创作不是简单地输入一句指令、接受一个结果,而是一个反复提问、补充材料、比较方案、修改内容的过程。这要求学生有明确的传播目的、基本的专业判断和不错的文字表达能力——提示语是否准确,说到底取决于使用者能不能把任务、受众、材料范围、表达形式和限制条件讲清楚。学生如果缺乏这些基础,生成的结果看起来越完整,反而越可能掩盖他对问题理解上的不足。

目前的教学评价大多只检查最终作品,很少关注学生是怎么使用资料的、怎么修改生成内容的、又是怎么说明创作依据的。这让教师难以判断作品中哪些部分真正体现了学生自己的能力,也不利于学生养成规范使用工具的习惯。人机协同能力的培养,因此有必要保留一些必要的过程记录,比如资料清单、重要指令、修改说明和事实核验依据。

(四) 价值教育与专业制作有时相互分离

在部分课程中,价值教育主要体现在课堂导入、案例讲解或作品主题选择这些环节,一旦进入具体制作,评价的重点又回到画面、节奏、技术和传播数据上。这种安排容易让价值要求停留在一般性的表态上,没有真正转化为材料选择、人物塑造、叙事视角和发布规范这些具体标准。

红色文化项目恰好为解决这一问题提供了较好的实践条件。学生必须面对史实准确与艺术表达、严肃主题与青年化传播、技术创新与内容规范之间的张力,这些问题不是靠一次理论讲授就能解决的,需要教师在项目推进过程中持续指导,并联合思政课教师、行业人员和相关场馆工作人员一起审核。

(五) 校内任务与真实传播环境衔接不足

课堂作业通常有明确的提交时间和评分要求,但真实项目还牵涉委托方需求、素材授权、团队分工、发布风险和后续修改这些环节。如果实践教学只要求学生交一个视频或一份策划书,学生对职业工作的理解就仍然是不完整的。校企合作也不能只停留在参观、讲座和短期实习上,而应把企业或公共文化机构的真实任务,转化成适合教学的项目。

真实项目进课堂时,还需要控制好难度和风险。教师应根据课程目标把任务拆解开,明确资料边界和审核程序,避免学生直接承担超出自身能力范围的公共发布责任。学校实践平台的作用,是给学生提供一个可以反复试验、反复修改的环境,而不是简单地复制企业的生产流程。

(六) 评价方式难以反映学生能力形成过程

网络与新媒体专业课程常见的评价方式,无非是平时作业、期末作品和课堂表现。这些方式操作起来方便,但对资料检索、方案比较、团队协作、数据分析和内容修订这些能力的考察并不充分。同一件作品,可能是少数学生承担了主要工作,也可能较多依赖模板或生成工具完成,单看成品很难准确判断学生个人的学习情况。

评价改革未必要简单增加指标数量,更重要的是围绕课程任务保留住关键证据——选题依据、资料出处、脚本修改记录、拍摄记录、生成内容核验情况、传播数据分析和个人反思,都可以作为评价材料。教师评价、学生互评和校外人员意见可以相互补充,但课程教师仍应对最终成绩和内容规范承担主要责任。

四、能力错位的主要原因

（一）职业本科类型定位尚未充分落实到课程层面

职业本科教育强调职业性、实践性和本科层次要求。落实到网络与新媒体专业上，既不能简单压缩普通本科的课程，也不能把专科层次的技能课程直接拉长。目前部分课程之间缺少清晰的能力递进关系，理论课程与实践课程各自运行，专业基础、技术应用和综合项目之间的衔接还不够紧密。这也说明，类型定位还需要通过课程目标、教学任务和评价要求进一步落实到位。

（二）课程调整机制难以及时回应行业变化

新媒体岗位和工具的变化较快，学校课程建设却有相对的稳定性。稳定性有利于保证基本的教学秩序，但也可能导致新内容进入课程的速度偏慢。解决这一问题，不宜靠频繁更换课程名称，而应在保持专业基础课程稳定的前提下，为项目任务、案例材料和工具训练留出可以调整的空间——课程标准明确相对稳定的能力目标，具体的工具和案例则跟着行业变化定期更新。

（三）校企合作的教学转化程度不高

企业项目具有真实性，但企业更在意完成时限和传播效果，学校更在意学生的学习过程。如果双方没能共同设计任务，企业项目要么变成少数学生的生产活动，要么因为难度过高而无法进入常规课堂。校企合作能不能产生真正的教学效果，关键还是在于企业需求能不能转化为课程目标、学习任务和评价材料。

（四）教师数智教学能力和跨专业合作仍需加强

网络与新媒体专业涉及新闻传播、艺术设计、信息技术和市场运营等多个领域，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出现又带来了新的知识要求，单个教师很难对所有环节都熟悉。教师发展不能只安排工具培训，还应涵盖项目设计、数据分析、版权规范、事实核验和智能生成风险等内容，同时也需要加强专业教师之间、以及专业教师与思政课教师、企业人员之间的合作。

五、数智转型背景下职业本科网络与新媒体专业人才培养的重构路径

（一）根据工作任务调整人才培养目标

人才培养目标应从掌握若干媒体制作技能，转向能够完成数智传播项目中的主要工作（吴一鸣、孙凯，2025；邱飞岳等，2024）。在原有的策划、采写、拍摄、剪辑和运营能力基础上，还应增加资料核验、数据解释、大模型应用、跨平台适配和传播风险判断等要求。这些要求不能只写进人才培养方案，还需要分解落实到课程标准、项目任务和毕业要求当中。

结合江西红色文化传播的需要，网络与新媒体专业学生的能力可以概括为价值判断、内容生产、数据分析和人机协同四个方面：价值判断涉及政治方向、史实意识、传播伦理和社会责任；内容生产涉及选题、调查、写作、视听表达和平台适配；数据分析涉及基本数据整理、用户反馈理解和传播效果判断；人机协同涉及任务说明、生成结果比较、事实核验和修改完善。这四个方面并非彼此孤立，而应在课程学习中相互联系、相互支撑。

（二）按照项目过程调整课程内容

课程改革应当减少围绕软件菜单和单项功能的重复训练，把知识和技能放进较为完整的项目过程中去（朱秋月等，2024）。比如一个红色人物短视频项目，就可以涵盖资料搜集、选题论证、受众分析、脚本写作、分镜设计、拍摄制作、内容审核和传播复盘等环节，不同课程分别承担其中的重点任务，同时共享必要的素材规范和评价要求。

课程内容的调整并不意味着所有课程都要套用同一种项目模式（祝智庭、胡姣，2022；祝智庭等，2022）。新闻采写课程可以突出采访和事实核验，视听语言课程可以突出画面与声音表达，数据分析课程

可以突出传播数据处理,综合实践课程再把这些能力集中起来运用。这样既能保持各门课程自身的专业边界,也能减少学生只会单项操作、不会综合运用问题。

（三）把红色文化资源转化为持续性的专业实践内容

江西的红色文化资源具有鲜明的区域特点,能为网络与新媒体专业提供比较稳定的内容来源(张珊、周琪,2025)。学校可以围绕革命旧址、红色人物、红色家书、革命文物和地方记忆等,逐步整理出文字、图片、音视频和空间资料,资料建设过程中要重视来源记录、使用权限和内容审核,不能把素材库简单理解成文件汇总。

项目选题应当从小处入手,避免空泛宏大的表达。学生完全可以围绕一封家书、一件文物、一处旧址或一段口述材料展开调查,在准确理解材料的前提下选择合适的媒介——短视频、图文专题、互动页面、音频节目、虚拟展陈各有各的特点,不应为了追求技术效果而选用不适合内容的形式。

（四）规范大模型在学习和创作中的使用

大模型可以用于选题发散、资料线索整理、脚本初稿比较、分镜方案讨论、字幕检查和评论文本归纳,但代替不了原始资料阅读、实地调查和教师审核(陈玉琨,2023;张治,2023;兰国帅等,2023)。课程开始前应说明清楚哪些情形允许使用、哪些情形受到限制,要求学生保存重要的使用记录,并在作品说明中交代生成内容的范围和修改情况。

红色文化内容在使用大模型时,应当建立资料对照的要求。凡是涉及具体时间、地点、人物、事件和引文的内容,都应以党史文献、地方志、纪念馆资料、权威媒体报道或正式出版物为依据;生成的图片和视频,也需要检查人物形象、服饰、建筑、器物和环境是否符合历史情境。没有经过核验的内容,不得直接用于公开传播。

教师评价应关注学生有没有提出清晰的问题,能不能比较不同的生成结果,是否发现并修正了错误,而不只是看作品里用没用新工具(马丹,2025;徐国庆等,2023)。这样一来,大模型才能真正成为训练专业判断的辅助工具,而不至于取代学生自己的劳动。丁钢认为,生成式人工智能对教育的影响不只是资源和工具层面的变化,还会带动学习方式、教师角色和评价方式的调整(丁钢,2025;杨宗凯等,2023)。

（五）改进实践教学和校企合作方式

学校可以先选一到两门核心课程试点,联合红色教育基地、主流媒体或文旅企业一起提出项目需求。校外人员主要负责提供真实问题、行业规范和成果反馈,课程教师负责教学安排、过程指导和成绩评定。对于适合公开发布的优秀作品,可以在完成史实、版权和价值审核之后,再考虑进入实际传播平台。

实践项目应当形成稳定的资料记录,包括任务书、学生方案、修改过程、教师意见、校外反馈和最终作品,这些材料既是课程评价的依据,也是后续研究教学效果的重要资料。在条件有限的情况下,不妨先从校内工作室和课程项目做起,不必一开始就追求大规模合作和复杂的平台建设。

（六）建立以过程证据为基础的评价方式

评价内容应当与能力目标保持一致(王佑镁等,2024)。对红色数智传播项目,可以从内容准确、叙事表达、技术完成、平台适配、工具使用规范和团队贡献这几个方面进行评价,其中内容准确和价值导向应作为基本要求——出现重要史实错误,或者未经说明就使用了生成内容,就应当要求修改,不能靠画面效果去抵消内容上的问题。

过程评价应当挑选那些能反映能力变化的关键材料,不必增加太多表格。选题说明、资料清单、脚本版本、修改记录、个人分工和项目反思,已经能提供比较充分的依据。期末作品反映的是综合完成情

况,过程材料则用来判断学生是怎么完成任务的,两者结合起来,才能提高评价的可信度。

利益冲突

作者声明,在发表本文方面不存在任何利益冲突。

参考文献

- [1] 王茜. 跨界与重构: 智媒体背景下全媒体运营师培养 [J]. 传媒, 2021(13): 88-90.
- [2] 李光辉, 林嵩. 现代职业教育体系下应用型高校网络与新媒体专业特色人才培养探析: 以福建技术师范学院为例 [J]. 福建技术师范学院学报, 2024, 42(6): 123-128, 137.
- [3] 刘黎, 郑海燕. 红色文化数字化传播创新策略研究 [J]. 传媒, 2022(20): 80-83.
- [4] 姜晔, 黄静, 程煜. 红色文化遗产资源数字化传播与创新发展研究 [J]. 山东图书馆学刊, 2022(5): 39-44.
- [5] 汪路金, 王永桂, 丁小英. 红色文化资源数字化保护现状及对策研究: 基于黄山市的个案分析 [J]. 邢台学院学报, 2022, 37(3): 43-49.
- [6] 徐国庆, 蔡金芳, 姜蓓佳, 等. ChatGPT/生成式人工智能与未来职业教育 [J].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 2023, 41(7): 64-77.
- [7] 丁钢. 生成式 AI 驱动下的中国教育重构 [J]. 探索与争鸣, 2025(3): 19-22.
- [8] 马丹. 人工智能+如何引领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发展? [J]. 职业技术教育, 2025, 46(14): 1.
- [9] 魏伟, 加鹏飞, 王傲冰. 知识论视角下职业本科人才培养定位的内在逻辑与变革路径 [J]. 中国职业技术教育, 2023(16): 82-88.
- [10] 吴一鸣, 孙凯. 职业教育数智化转型: 内涵特征、发展动因与变革趋向 [J]. 职业技术教育, 2025, 46(19): 59-65.
- [11] 邱飞岳, 刘雪冰, 张彭丽, 等. 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 内涵、问题与路径 [J]. 职业技术教育, 2024, 45(9): 32-38.
- [12] 朱秋月, 邱爱琪, 徐顺. 数智时代职业教育有效课堂的内涵阐释、变革趋势与未来图景 [J]. 职业技术教育, 2024, 45(10): 31-37.
- [13] 杨宗凯, 王俊, 吴砥, 陈旭. ChatGPT/生成式人工智能对教育的影响探析及应对策略 [J].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 2023, 41(7): 26-35.
- [14] 周洪宇, 李宇阳. 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 ChatGPT 与教育治理现代化: 兼论数字化时代的教育治理转型 [J].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 2023, 41(7): 36-46.
- [15] 江波, 丁莹雯, 魏雨昂. 教育数字化转型的核心技术引擎: 可信教育人工智能 [J].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 2023, 41(3): 52-61.
- [16] 陈玉琨. ChatGPT/生成式人工智能时代的教育变革 [J].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 2023, 41(7): 103-116.
- [17] 张治. ChatGPT/生成式人工智能重塑教育的底层逻辑和可能路径 [J].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 2023, 41(7): 131-142.
- [18] 张黎, 周霖, 赵磊磊. 生成式人工智能教育应用风险及其规避: 基于教育主体性视角 [J]. 开放教育研究, 2023, 29(5): 47-53.
- [19] 童慧, 杨彦军. 基于技术道德化理论的生成式人工智能教育应用潜能与风险研究 [J]. 电化教育研

- 究, 2024, 45(7): 12-18.
- [20] 王佑镁, 王欣颖, 柳晨晨. 教育领域生成式人工智能应用的伦理风险管理框架研究 [J]. 电化教育研究, 2024, 45(10): 28-34, 42.
- [21] 吴砥, 吴河江. 通用大模型教育应用的潜在风险及其规避: 基于技术伦理的视角 [J].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 (教育科学版), 2024, 42(8): 64-75.
- [22] 兰国帅, 杜水莲, 宋帆, 等. 生成式人工智能教育: 关键争议、促进方法与未来议题 [J]. 开放教育研究, 2023, 29(6): 15-26.
- [23] 祝智庭, 胡姣. 教育数字化转型的本质探析与研究展望 [J]. 中国电化教育, 2022(4): 1-8, 25.
- [24] 祝智庭, 李宁宇, 王佑镁. 数字达尔文时代的职教数字化转型: 发展机遇与行动建议 [J]. 电化教育研究, 2022, 43(11): 5-14.
- [25] 张珊, 周琪. 人工智能时代的红色文化精准传播: 机遇、模式与策略 [J]. 海南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 2025, 43(5): 159-165.